

反馬克思大師卡爾巴柏及其否認論

蕭真美

一、前言

二十世紀，人類思潮形成兩極分化的對峙局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馬克思 (Karl Marx) 唯物辯證哲學的陰影之下。另一方面，歐美之自由與科學的倡導，驅使各種思想派別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分析哲學^①，乃其中一支。

馬克思擷取黑格爾 (Hegel GFW) 的辯證哲學和費爾巴哈 (Feverbach L) 的唯物論，合其「唯物辯證哲學」^②，認為物質決定存在，歷史的發展是由物質循着「正」、「反」、「合」的辯證法則而進化推動的。

分析哲學，則起自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邏輯實證論 (Logic Positivism)，由反對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的思潮，主張設立現代的經驗主義，用科學方法建立知識開始，歷經對形上語言的廓清而牽涉到語言分析、語意研究，到牛津學派的「語言行為學」，脫離抽象的形式主義，探討語言在實際生活經驗表現的「語言社會學」為止，已成爲英美現代哲學主流之一。

卡爾巴柏 (Karl R. Popper)，以一名科學家的睿智，對馬克思主義和分析哲學中的「邏輯實證論」，提出最有力的批判。整部西洋哲學史，可以說是個追求「最終真理」的傳統。此一傳統表現在知識論上，便是對「第一因」的執着；表現在社會思想上，便是對「完美社會」的渴求。巴柏基本上反對這樣的思考傾向，他認爲西洋思想史上的諸多爭端，乃至今日的極權思想，都直接來自追求「絕對真理」的心態。因此，他在哲學上選擇邏輯實證論，在社會思想上選擇馬克思，做爲他主要的批評對象。本文擬先敘述巴柏在批判邏輯實證論的同時，創發了其獨有的「否認論」，並以「否認法」爲中心，展開其對馬克思等人的「歷史定論主義」的批評；再介紹其頗富啓示性的政治思想。

二、卡爾巴柏其人

卡爾巴柏雖不是一個極端顯赫的人物，但他思想的影響却深入各階層。

註① 見拙作，「分析哲學概觀」，〈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八卷第十期，民國七十年十月一日。
註② 姜新立，「共黨唯物辯證法批評」，〈共黨問題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十四頁。

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的神經生理學家艾克爾斯（J. Eccles）曾表示：巴柏的哲學對他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影響。

美國著名的物理理論家芬曼（R. Feynman）在「物理定律的特點」一書中，表述了與巴柏的方法論幾乎一樣的看法。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米德渥（Peter Medawar），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英國廣播電臺」評價巴柏道：「在我的看法裏，巴柏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

艾薩白林（Isaiah Berlin）在他寫的「馬克思傳記」（“Karl Marx” 一九六三年三版）裏，形容巴柏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這一部書，是「所有批評馬克思之哲學與歷史思想的當代作品中，最負責、最着力的一部」^③。

諾貝爾獎得主，阿克斯（John Eccles）在「面對實在」（*Facing Reality*）中寫道：「我的科學生涯主要得力於一九四五年的一次轉變，如果各位不見笑的話，其實我指的就是巴柏在科學研究方法上對我的影響。在生物神經學的研究上，我很花了一番氣力追隨巴柏在找出基本問題、處理基本問題時的方式」。阿克斯對其他科學家的建議是：「去讀巴柏的科學哲學，去思索巴柏的科學哲學，然後把所得用來做為你研究態度的基礎。」

巴柏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則有：

知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龐弟（Hermann Bondi）曾簡單說了下面一句話：「科學上沒有比方法更重要的事了，而方法上沒有人比比巴柏說得更清楚的了。」

羣芮奇（Ernst Gombrich）在「藝術與假象」（*Art and Illusion*）一書序言中寫道：「如果讀這本書的人感覺到巴柏的影響無所不至，我會引以為傲。」

英國兩大政黨的閣員中，也都有受到巴柏政治思想影響的人，如 Anthony Crosland 和 Edward Boyle。知道了巴柏思想影響深遠，也備受讚譽，再看其生平。

巴柏於一九〇二年生於維也納。少年期和青年期是馬克思的信徒，後來轉變成前進的社會民主黨員。大學時專攻數學、物理學和哲學。除了科學和哲學的研究外，他還參加政治活動和音樂組織^④。畢業後，在中學教數學、物理，但真正貢獻心智的地方是社會工作、政治活動、音樂和哲學。當時統領奧國思想的，是維也納學圈所倡的邏輯實證論。在此思潮下，他的思想格格不入。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科學發現之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主要是批評邏輯實證論，因此內容被刪減，只剩原書的一半。

註③ 馬基著，周仲庚譯，「卡爾巴柏」，第一頁。

註④ 荷貝格（Schoenberg）的私人音樂會組織（Society for Private Concerts）。

一九三〇年代，維也納的政治鬭爭很激烈，共產黨與法西斯主義者互相攻擊。而在這後面，也有許多關於政治手段與政治道德衝突的激烈辯論。這對巴柏日後政治思想的形成，深具影響。爲了避開希特勒的瘋狂屠殺（他是猶太血統），一九三七年遠赴紐西蘭 Canterbury 大學教哲學，到一九四五年爲止。在此期間，他自修希臘文以便研讀希臘哲學，並在一九四三年完成了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在一九四五年出版。在這段期間，希特勒入侵奧國，二次大戰的結果一直未能明朗，因而更刺激了巴柏捍衛自由和打擊極權的熱情，也促使他更加想要解釋爲什麼極權吸引人的道理。

一九四六年，巴柏去英國，在倫敦大學的經濟學院進修研讀，直到今天^⑤。他到英國時，英國哲學界的潮流，正是他離開奧國時拋諸腦後的「邏輯實證論」。邏輯實證論傳到英國，是經由艾爾 (A. J. Ayer) 的「語言、真理及邏輯」一書，而巴柏的「科學發現之邏輯」當時尚未有英文譯本，在英國可以說無人知道。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德文版發行了半個世紀後，該書的英譯本才問世。結果中年的巴柏仍與英國格格不入，就像他年輕時在奧國一樣。然而，他的國際聲譽還是一天天在擴大。

一九四九年後，巴柏一直是經濟學院邏輯和科學方法的教授，並爲系主任，也是英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在此期間，他又出版兩本書，一爲一九五七年的「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這本書可看做「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註腳。另一本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臆測與否認：科學知識的成長」(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可視爲「科學發現之邏輯」一書的闡釋。

一九六四年，巴柏受英皇封勳爵士。一九六九年退休後，又於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客觀知識：一個演化的觀點」^⑥。

三、否認論的源起

巴柏以否認論 (Falsificationism) 思想爲旗幟而登上哲學舞臺，他的科學觀、政治觀和社會觀，都是以否認思想爲中心而衍發。他不是邏輯實證論學派的一分子，而且還是他們的反對者；然而，他的「否認論」的靈感，無疑是來自這一派的哲學。邏輯實證論的哲學主張^⑦：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巴柏所著書，詳細書目見「當代哲學家批評集」中的「卡爾巴柏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Karl R. Popper) 一書，此處所談巴柏之五本書，前四冊在臺灣有翻譯版，由虹橋出版社印行。

註⑦ 戴華山，「語意學」第六十二頁。

(一)廢除「哲學」一詞，而代之以「統一的科學」，或「科學的經驗論」。

(二)世界由「原子事實」構造而成，而邏輯則為世界之格架。

(三)一切科學命題是綜合命題、事實命題，而其真偽標準，則在於「可檢證性」(Verifiability)。

(四)形上學命題包括倫理學、美學等，取綜合命題的形式，然而却不可驗證。

(五)哲學即科學命題的邏輯分析，哲學可還原於邏輯。

(六)應當建立一種理想的語言。

我們知道，以邏輯實證論為中心的分析哲學的哲學家，大多是科學和邏輯的從業者。他們認為古典哲學中的問題，諸如「上帝存不存在？」「一根針尖上有幾個天使在跳舞？」等，都是荒誕不經的語言遊戲而已。如果能把字義釐清，語意弄懂，則哲學中的難題都可迎刃而解。而建立新的哲學，則要靠邏輯；要釐清哲學語句，則要用「檢證」的科學方法。能通過「檢證」的語句，與事實相印證的語句，才能够成立，否則即是無意義，應該剔除。邏輯實證論這種「可檢證性」的科學觀，不啻是一種新的經驗論，認為真的知識，要與事實經驗相符合。雖然後來邏輯實證論者因無法解答如何才能驗證他們自己的「可檢證」的說法為真抑假，而使此派哲學趨於沒落；然而，在三、四十年代的歐陸，邏輯實證論的確風行一時。其後，分析哲學家走的，都是與邏輯實證論相反的道路，不是批判該派的理論，就是着重於把「語言行為」帶進思維中，並進而發展出探討語言在實際生活經驗的表現，在社會文化價值上的角色^⑥。巴柏「否認法」的提出，可以說是批判最力的創作。

除了邏輯實證論外，「否認論」的靈感還來自愛因斯坦。當時的物理學正處在革命之中，相對論震天價響地降臨人間，巴柏受到感應而喚起了他的智慧。牛頓理論經受過千萬次檢驗，曾獲得史無前例的驚人成就，而愛因斯坦却給它以沉重的打擊，這一打擊，使得巴柏有了許多想法。

他想到，任何科學理論，不管受過多麼嚴格的檢驗，不管曾經多麼成功，都可以被推翻、被否認。即使像光輝的牛頓理論那樣的科學理論也不過是一種假說、推測。科學就是由嘗試性的、假說性的、推測性的理論所組成。對於幾乎任何理論，只要有意去找，都可找到它的證實或證明。然而，這種「不可否認性」並不像人們通常所想的，是一個優點，而「可否認性」也不是一個缺陷。所謂一個理論的可否認性，是說總可能存在和這個理論不相符合的事件。他認為，對於理論的真正檢驗不在於試圖證實它，而在於試圖否認它。因此，他的結論是：一個理論的科學性標準就在於可否證性。一種不能為任何想像的事件所否認的理論，即為不具有可否證性的理論，是非科學的。例如：「太陽從東邊升起」，這是可否證的，因此是科學語句；而「上帝存在」這是

註⑥ 黃宜範，「翻譯與語意之間」及胡基峻，「語言與哲學」等書。

無否證性的，因此不是科學語句。同樣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完全暴露於否證之下。一九一九年，英國著名天文學家愛丁頓率隊檢驗相對論的引力理論時，如果他的觀測獲得否定結果，相對論就被否證，所以巴柏認為相對論是科學的。相反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都像占卜者那樣，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以致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就是沒有可否證性，同時也就是非科學。

巴柏由此而發明了他的「否證論」。否證論的核心概念可歸納為三點^⑨：

(一)「可否證性」概念。這是回答「什麼時候，一種理論才應當列為科學的？」或「一種理論的科學性質或者科學地位有沒有一個標準？」也即是「經驗科學是什麼？」等問題的答案。這也就是所謂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問題」。巴柏試圖把經驗科學的命題及由它們所構成的體系劃分在一邊，而把其他的陳述劃分在另一邊，後者包括宗教性陳述、形上學陳述、偽科學的陳述，純邏輯和純數學。

(二)「歸納問題」，問題是歸納推理是否正確？或者在什麼條件下才是正確？巴柏亦稱此為「休謨的歸納問題」。他讚揚休謨正確地指出了「歸納法」在邏輯上不能成立^⑩。而這正是傳統觀點的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野。傳統觀點認為由「歸納法」得出的結論才是科學的。然而，由邏輯上舉例來看，「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種由經驗得出的一般陳述，却很可能由於某人某一天，突然發現有隻黑天鵝而被推翻。無論我們看到多少次白天鵝，由這些無數對白天鵝的觀察命題中，邏輯上我們還是無法導出「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個全稱命題。但是，只要看到一次黑天鵝，我們便可導出「並非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個命題。因此，歸納法是不能做為科學的基礎的。對於經驗的通則化（即全稱性的經驗命題）雖不可以實證，但却可以否證^⑪。這表示，科學定律雖無法證明，但我們可以測驗它，有系統地嘗試去否決它。這也是「可否證性」思想的推行。由此，巴柏提出了與「歸納法」不同的「試錯法」(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做為檢驗科學的方法。他認為科學方法，只不過是「試錯法」的一種，辯證法

註⑨ 舒煒光，「卡爾·波普爾的否證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八一年三月號，第六十八頁。

註⑩ 這是普通意義下的歸納法，與嚴謹的「數學歸納法」不同。數學歸納法如下：

若 I 表所有的自然數， X 屬於 I
若 $X=1$ 時，事件 P 成立。

設 $X=N$ 時，事件 P 成立，則如能證明

$X=N+1$ 時， P 亦成立，則任何情況下，

P 皆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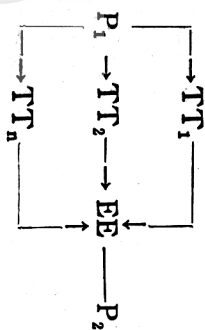
註⑪ 同註⑨，第十六頁。

也是。對於試錯法，巴柏的描述是：提出大膽的假說，並使它們面臨最嚴格的批判，以便覺察我們犯錯誤的所在。這裏強調的是否證。他認為：科學家努力從各個方面對所提出的試探性理論進行批判，以便找出它可能有的弱點；批判與檢驗同時進行，對理論的檢驗就是通過把它的弱點暴露於儘可能嚴格的檢查來進行。

(三)由前面兩種思想，巴柏導出了「否證方法的問題」。這是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文集「臆測與否證」中，對試錯法的簡要總結：我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巴柏把這個論點稱為理性態度，或一種基於自由批評和討論的方法。這在其否證性四段圖式中，得到明顯的表現。這個圖式的簡單形式是：

$$P_1 \rightarrow TT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_2$$

其中 P 表示問題， TT 表示試探性理論， EE 表示消除錯誤， P_2 表示產生的新問題。這個圖式是說：從問題出發，試探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即試探性理論，通過檢驗理論而消除錯誤，產生新的問題^②。四段圖式的複雜形式是：



有了成套的否證方法之後，巴柏的可否證性概念即如虎添翼。它在認識論、方法論和科學哲學中的許多問題間飛來飛去。不僅如此，可否證性概念還滲透在巴柏的政治理論和歷史觀之中。他的政治哲學、社會哲學與科學哲學有許多共通的觀念。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他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的基礎。因此，可否證性概念在他的政治觀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例如，他用否證性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而寫成了「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被視為批判馬克思的力作；而可錯論 (Fallibilism) 主張任何人都會犯錯，應用於政治就必定要求：排除一切權威和權威主義。「在政治領域裏，從錯誤中學習的方法，就是基於對政府的行動進行自由批判和自由討論的一種方法」^③，而他認為「容許批判」的政府便是民主政府，這是與極權對立的。

註② 舒煒光，「評介波普的否證方法」，《哲學研究》，一九八一年二月號，第七十二頁。

註③ B·馬奇：「現代英國哲學」，一九七一年英文版，第八〇頁。

四、否證法的運用

如前所述，巴柏的「否證論」原本來自他的科學觀，但他又以此為中心思想，而創發了他與眾不同的歷史觀、社會觀和政治思想。下面舉例來闡釋他如何運用「否證法」而成為現代反馬克思的宗師。

巴柏在一九五七年寫就的「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一書，是站在方法論的觀點上，來批判馬克思等人的歷史觀的。全書共四章：「反自然主義的歷史定論主義」、「傾自然主義的歷史定論主義」、「反自然主義學說批判」、「傾自然主義學說批判」。巴柏所謂的「歷史定論主義」，是指由柏拉圖以降，至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人，皆相信：歷史是有規則可循的，因此可加以預測。由此而推廣到社會科學的「歷史定論主義學說」，此一學說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在於提出歷史預言；而如果要我們用合理性的方式來處理政治的話，我們也要借重歷史預言。

巴柏「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一書，便是批判這種觀點，他在原序中說得很明白，其內容可簡要歸納成五點^④：

(一) 人類的歷史是強烈地受到人類知識成長的影響。(此一論點的真確性，即使是那些以為我們的觀念，包括科學觀念，都只不過是某種物質發展的副產品的人也不得不承認。)

(二) 我們不論用理性的或科學的方法，都無法預測科學知識之未來發展。(此一主張可以引用以下概述的論點來做一個邏輯性的證明)。

(三) 因此，我們無法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

(四) 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排斥建立理論歷史 (theoretical history) 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排斥建立和理論物理 (theoretical physics) 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的可能性。我們無法找到任何歷史發展的科學理論足以做為歷史預測的基礎。

(五) 因此歷史定論主義者的方法所想要達到的基本目標乃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歷史定論主義於是崩潰。

就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言，未來的歷史必為共產主義社會，而此共產主義社會必定要建立在資本發達的工業國家。因此，革命遲早會來。這種「歷史定論」的觀點並非馬克思所獨有，而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即已假設人類歷史有一規則的架構存在。馬克思承襲這種方法，將整個人類社會的變動做了自認為是「科學的」預測，而把「歷史」

註④ 卡爾巴柏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原序。

解釋成階級鬭爭的歷史或種族競爭的歷史，再將此種解釋視爲一部「歷史科學」，殊不知這只是解釋人類社會的幾百種觀點中的一種而已。「這些解釋多多少少都是有趣的觀點。因此就作爲一種有趣的觀點而言，它們是絕對無法被反駁的。但是歷史定論主義者却不把它們看做是一種有趣的觀點而已；他們不曉得有許許多多的解釋，不管在『提示性』(suggestiveness)或『獨斷性』(arbitrariness)上來說，根本都是具有相等重要地位的。相反的，他們把那些解釋看成是教條，或者是理論，因而聲稱『所有的歷史乃是階級鬭爭的歷史』等等。而只要他們一發現他們的觀點是很具有繁衍性的，並且許多事實也可以從那個觀點來解釋、處理的話，他們就誤以爲這種現象就是其教條的證實，甚或證明」¹⁹。巴柏如此批判馬克思的歷史定論主義，並宣稱「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乃是「一種想像力的窮困」，說「他們無法想像：導致變遷之情況的改變」²⁰。巴柏舉了一例：馬克思認定有一個朝向「生產工具的累積」的趨勢存在，但是，在人口急速降低的情況下，我們却幾乎不可能找到這種趨勢。同時，這種人口的減少還會受到經濟以外情況的影響，如偶然的發明，或者工業環境對病理上(或生化學上)所直接造成的衝擊。

巴柏在「臆測與否認」一書中，以第十六章「社會科學中的預測與預言」，對這種歷史定論主義的社會科學做了極爲邏輯性的批判，最後並運用「否認法」作出結論：「理論社會科學的任務在於發掘吾人之行動所無意造成的結果」，這可以引導我們做出「我們無法達成什麼」的實際性的技術規則。例如：「除非提高生產量，否則我們無法提高工人的真正收益」；或是「我們無法造成充分就業而不造成通貨膨脹」。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社會科學如何在實際上產生了重要性。它們雖然不能夠使我們去預言歷史發展，但是它們却能夠給我們一個概念，告訴我們在政治上我們能做到那些事，不能做到那些事。

「否認論」運用在這種歷史觀上，便是：我們不能說歷史一定會如何發展，而只能說，要是社會上有某一種情境發生，則必不會發生另某一種情境。因此，我們就知道，我們該做什麼。

另外，「否認論」也運用在對社會的看法上而產生了巴柏的「開放社會觀」²¹。巴柏認爲，生存基本上是一個用試錯法解決問題的過程，所以他樂見一個有助於解決問題的社會；再者，由於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有足以交付批評、修正的大膽嘗試性方案，他贊成一個可以容納任何積極方案，並隨之提供批評的實際行動的社會。在不做任何道德的考慮下，他認爲一個符合這樣方式的社會組織，在解決問題上，在達成其成員的目標上，會較其他形式的社會更有效。他又說：所有的中央政策，實際上一切的行政決定，都涉及到經驗上的預期：「如果我們做了X，就會帶來Y；或者，如果我們想要B，就得做A。」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

註¹⁹ 同註¹⁸，第二二六頁至二二七頁。

註²⁰ 同註¹⁹，第一〇七頁至一〇八頁。

註²¹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類的預測常常是錯的——人人都會犯錯；此外，在實行的過程中同時修正（在此，便是否證法，也即是試錯法的運用），也是正常的現象。一個政策，只是一項假說，必得要接受事實的考驗及經驗的修正。在實施前以討論、批評來發現其錯誤及內在的危險，是一種極為理性的步驟，而且必然會比「讓時間來證明一切」的態度減少資源、人力、時間上的浪費。更進一步說，只有常常經過實際結果的評價，人們才能發現該政策的某些錯誤所在^⑭。而這樣一個容許人們試錯、批評、修正政府政策的社會，便是開放的社會。

配合這種社會觀，巴柏導出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認為「民主政治」(Democracy)與「暴政」(Tyranny)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不用暴力就能更換的政府形態，而後者則否。民主的政府，是政策容許民衆批評的政府。因此，他批評烏托邦主義者的「未來的社會、經過革命後所建立的社會才是完美的社會」的論調，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理論忽略了社會生活的最重要的一個層面，那就是我們所需要的與其說是許多好人，不如說是一個好的制度，一個容許不經暴力即能更換的政治制度。因為即使是最優秀的人，也會被權力腐化；但是，能够容許被統治者施加某種有效控制的制度，也能逼使壞統治者去做符合民衆利益的事。因此，巴柏結論說：「我們希望獲得好的統治者^⑮，但是我們從歷史經驗中却知道，我們不太可能獲得這些好的統治者。也就是基於這個緣故，建立一個可以防止壞統治者做太多壞事的制度，才會成爲如此重要的事。……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從制度的觀點來看問題；他們把信仰放在某些人物身上，如無產階級，這是因爲他們相信階級及階級效忠乃是最重要的事。理性主義者正好相反，他們比較喜歡用制度來控制人的辦法，這是主要的區別」^⑯。

否證法運用在這種政治理想上，便是主張：民主政府應該把剷除弊害的工作，視爲公共政府的目標，但是，對於增進幸福的工作，應當委諸於私人的主動性。也就是，在此時此地，把最急迫的真正的社會之「惡」，一一解決，而不要爲了一個遙遠的、或許永遠無法實現的「最大幸福」（如馬克思的共產世界），一個烏托邦，而犧牲世世代代的人們。

五、結 論

巴柏以「否證論」做爲其整套哲學的中心思想，這種方法有明顯的實用價值。從方法論上來說，這樣的方法與科學研究中實際所用的一些具體方法很類似，如淘汰法、優選法、消除法等。試錯法本是一些科學家（如化學家、心理學家）等所熟悉的，而

註^⑭ 同註^⑮，第一〇三頁。

註^⑮ 如馬克思主義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

註^⑯ 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ch. 16.

「從錯誤中學習」的人生態度，也給人們不少啓示。然而，「否認論」也有其缺點^㉑，例如：

(一)按照巴柏的定義，任何「科學性的」理論，應該「存在有可能與之矛盾的檢證事件，亦即存有可否證性」，既然如此，那表示此套理論被否決的成份很高，如何又能說它是一套科學理論呢？如果要成爲一套屹立不倒不被否證的理論，那又不能稱其爲「科學的」了。如此，巴柏可說是一個「懷疑論」者，在他的心目中，每一套理論，其成立的基礎既脆弱又不明確。

(二)對否定性結果的驗證，本身是一種認識論上的問題。在複雜的理論或複雜的檢驗情況下，其結果否定了什麼，往往不是顯而易見的。對結果的分析，有可能帶進不可靠的成分。而且，個別的反面事例本身還可能不十分可靠。

(三)人類認識史和科學史表明，被個別事例或一些證據否定了的某個假設，有可能在另外的條件下重新被提出，或以變相的方式重新被提出。巴柏沒有說明這樣的事實，俾給否認作用加以應有的限制。

(四)爲一個理論找到某種逃避否認證的方法總是可能的。例如，引入特殊的輔助假設，對一個定義作相應的修改。甚至還可以採取乾脆否認任何否認證的經驗態度，而並不產生邏輯矛盾。

儘管如此，巴柏的「否認論」思想仍不失爲一個思想史上的創舉。尤其他以一個科學從業者的身份，能够在認識論上，從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人的辯證法的死胡同中，開出一條活路。且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做了媒妁，闡明此兩者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樣的——總是包含了演繹性的因果解釋，以及對這些解釋所做的試驗，亦即「假說性的演繹法」。他在社會觀及政治思想上，又指示了一個實際可行的原則——把握今日的社會，集中力量在消除現今社會或政治中的「惡」，使之更趨完滿，藉以代替將希望寄託於未來的另一個社會，而犧牲了這一代的幸福。就這些方面來看，巴柏的貢獻不可謂不大。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員，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九日完稿。)

註^㉑ 同註^㉒。